

国别文学研究

“9·11”小说的两种叙事维度： ——以《坠落的人》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为例

但汉松

内容提要：通过对德里罗《坠落的人》和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的对比阅读，本文认为9·11小说的基本叙事场域在于“悼歌”和“批判”的两轴。正是由于结合了这两个叙事维度，当代美国小说不仅克服了保守主义9·11话语的单义性和语境阙失，也纠正了左翼反美批评所未能实现的人文关怀，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叙事”力量。此外，9·11小说以内化的艺术审美视角，提出了对“恐怖主义 vs. 全球资本主义”的认知范式。

关键词：9·11小说 唐·德里罗 科伦·麦凯恩

作者简介：但汉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美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现当代小说和戏剧。

Title: Two Narrative Dimensions in “9/11” Novels: *Falling Man* and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ABSTRACT: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DeLillo's *Falling Man* and McCann's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rrative field of 9/11 novels exists on the vertical axis of “elegy”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of “critique.”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at helps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to overcome the context-free monosemy in conservative 9/11 discourses, and add more humanistic concerns to left-wing anti-Americanism. Given such a unique “counter-narrative,” 9/11 novel is in the position of seeing “terrorism vs. global capitalism” from an internalized aesthetic perspective and of realizing a new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in 9/11 narrative.

Keywords: 9/11 novel, Don DeLillo, Colum McCann

Author: Dan Hansong <dhs@nju.edu.cn>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China (210093).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are 20th century American fictions and dramas.

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已经倒下了整整十年，9·11事件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

深刻影响愈发凸显。冷战后的“历史”并未如福山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文明的剑拔弩张反而印证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先见之明。在宏大叙事之外，那个如人间炼狱的周二也成为了纽约人心中盘桓不去的集体记忆。“归零地”(Ground Zero)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后现代隐喻：象征资本主义欲望的世贸大厦被全球化进程的异议者阉割去势。9·11所展现的启示录般的毁灭与暴力，激发了本国作家书写“伟大美国小说”的雄心。(Buell 132-33)一些优秀的美国小说家(如厄普代克、罗斯、品钦、德里罗等)，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放在广阔深远的历史与伦理空间中进行审视和想象，已经写出了重要的9·11主题作品，它们已然成为了21世纪英语文学一个独特群类，即“9·11”小说^①。

在这批作品中，有两本小说尤其值得关注：《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 以下简称《坠》)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2009, 以下简称《转》)。前者出自文坛名宿唐·德里罗(Don DeLillo)，被评论界誉为德里罗“多年来最好的一部小说”(Miller)；后者由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 1965—)撰写，被《君子》(*Esquire*)杂志称为“第一部伟大的9·11小说”(Junod)，并荣获当年的“国家图书奖”。本文认为，两者恰好构造了后9·11文学叙事场域的竖轴与横轴——如果说德里罗是在共时的竖轴上探究恐怖袭击后普通纽约人的创伤与记忆，那么麦凯恩则是在历时的横轴上拼贴那座城市在70年代所折射的美国心灵史和救赎轨迹。《坠》和《转》在叙事角度和思想进路上的异同，不仅仅代表了作家们对于恐怖袭击事件本身的阐释选择，更昭示了美国当代文学在后9·11世界对于全球化、恐怖主义，乃至后现代社会人类的存在危机进行反思的多种路径。

一、创伤与记忆：《坠》中的“反叙事”

美国小说家在面对9·11事件时，通常无法逃避的两个问题是：(1)为什么“他们”要袭击“我们”？(2)“我们”在世贸中心倒塌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本身？在国家政治和公共媒体的层面上，答案似乎是确凿的。按布什政府的9·11叙事逻辑，恐怖分子是因为憎恨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才发动袭击的。通过不断重复双子塔的坍塌、纽约人的惊恐万状和废墟上的星条旗等画面，媒体围绕“创伤”(trauma)来构建这起新闻事件。而正如弗里茨·布莱特豪普特(Fritz Breithaupt)分析的，“创伤”背后的词语政治是，作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美国似乎承受的仅是无妄之灾。(69-70)循此前提，少数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被保守主义政客定义为“战争”，基地组织及为其提供庇护的塔利班和萨达姆被想象为“撒旦式”敌人，美国于是可以通过国家战争机器合法地予以报复，无需反省9·11袭击的“前历史”。

琳达·考夫曼(Linda Kauffman)认为，政客和媒体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9·11事件迅速地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并使之成为官方叙事”。(“Wake” 353-54)作为小说家的德里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即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劫机犯)以言说和悲悼的权利。(“Ruins” 35)德里罗说，这种反叙事存在于“人们携手从双子塔坠下”的“原始恐怖”中，作家的使命应是“赋予那片嚎叫的天空以记忆、温情和意义”。(39)

《坠》正是德里罗对自己9·11文学宣言的一次文本实践。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也仅是预言文化冲突的主战场将是伊斯兰和非伊斯兰文明交界的“流血的断层线”。(钱满素 245)而德里罗竟在70年代就在《球员们》(*Players*)里预言了世贸中心的遇袭和倒塌，后来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也提到了针对双子塔的恐怖阴谋。^②有学者据此认为，德里罗其实在9·11

成为历史之前就写出了启示录式的9·11主题小说。(O'Hagan)然而,一语成谶后的德里罗并未在《坠》中续写之前那种荒腔走板的后现代反讽,他更为关切的不再是这场灾难发生的必然性,而是归零地周围的人类生存处境。

这部纽约城市悼歌从一开始就以惨烈的细节再现了最残酷的灾难时刻:在北塔上班的基斯(Keith)在楼体倒塌之前侥幸逃出,一路目睹了曼哈顿下城那如人间炼狱的景象。身心严重受创的他鬼使神差回到了已分居的妻子家中,似乎得以回归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然而,因为错拿的公文包,他认识了同为北塔幸存者的佛洛伦斯(Florence),两人发现只有相互讲述自己的归零地经历,才能释缓被下意识压制的恐怖记忆。不仅那些恐怖袭击亲历者需要创伤疗救,作为旁观者的纽约市民也“试图理解9·11那天生命与死亡的随意无常”。(Kauffman, “Trauma” 649)基斯的妻子丽昂(Lianne)组织了一个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参加的写作小组,让他们在个体记忆湮没前说出自己的9·11体验。丽昂的父亲因为罹患此病而绝望自杀,所以她担心这种遗传性绝症最终也会将她所有记忆清空。基斯的儿子贾斯汀(Justin)虽然少不更事,但却同样对大人讳莫如深的这次灾难有着应激心理反应,他和玩伴天天用望远镜看着纽约上空,秘而不宣地希望能找到恐怖分子的踪影。

伊·安·卡普兰(E. Ann Kaplan)将创伤的影响描述为三类:心理身份的瓦解;日常生活中弥漫的威胁感;以及受辱和缺乏之感。(5,12-13)显然,基斯一家所代表的纽约人都不同程度处于9·11所带来的创伤之中,他们无法摆脱的心理症结是9·11事件的超现实感对日常生活的侵入与破坏,其症状体现为自我强迫式的重复,以克服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基斯之所以要一遍遍听佛洛伦斯讲述她如何在疏散下楼时大小便失禁的故事,是因为他“试图在那些人群中找到他自己”。(DeLillo, “Falling” 57)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处于某个无法走出的时间框格中,无法理解“他的生究竟意味着什么”(6)。

强迫式重复固然无法最终修复创伤,但却是走向疗救的第一步。在德里罗看来,治愈创伤的致命敌人是健忘症(amnesia),因为遗忘即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于是,阿尔茨海默症在全书中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它不仅仅是特定人群的生理疾病,更象征了后9·11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健忘症。考夫曼指出,正是由于主流媒体过度消费了这场被景观化的恐怖事件,那些被重复播放的现场以及受害者的画面最终只是呈现了“空洞的移情”,因为它们“无法提供哪怕半点语境,也无法讲述地区政治、全球联盟和历史”。(“Trauma” 650)如果在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一个社会只是选择浅薄化的解读和选择性的遗忘,那么不仅恐怖与死亡的意义就被完全抽空了,而且还会有更大灾难即将降临。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媒体实际上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们的同谋者。

为了对抗这种文化健忘症,小说里有个行为艺术家开始在纽约街头不断表演“坠落的人”——身着西装,腰系保险绳,从高处跳下。这个创意源自9·11新闻史上的一张著名照片,上面以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为背景,抓拍了某个绝望的办公室白领从高层自由下坠的瞬间。在这位艺术家看来,这是归零地人之处境的最佳写照,即: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符号坍塌之前,渺小的人类以自杀作为最后自由意志的实现。通过不断地将这个场景仪式化,艺术家试图提醒那些已经遗忘9·11内涵的纽约市民,悲剧的核心不是“废墟上不倒的星条旗”这些意识形态浓厚的新闻符号,而是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的恐怖与悲怆。

如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言,被大众媒体操控和展览的爱国主义体现了后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因为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我们丧失了悲悼的主体自由,“甚至连情感的反应都必

须通过媒体的指挥和放大”。(55)所以,《坠》正是在“悼歌”(elegy)的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对于9·11 创伤文化的反叙事。

二、历史与批判:作为9·11 寓言的《转》

麦凯恩与德里罗在9·11 叙事上的最大区别是叙事的时间视角。《坠》虽然是环形时间结构,但基本上是从恐怖袭击发生时开始,延续到之后两三年主人公们的生活。《转》的地理中心依然是纽约城,然而时间中轴却是1974 年夏天世贸中心刚建成时法国杂技师佩蒂特(Philippe Petit)惊世骇俗的高空行走。麦凯恩的这种时间安排似乎表达了一种9·11 史观,即:理解这次灾难必须基于足够宽宏深远的语境,而不是像官方叙事一样以2001 年9 月的那个星期二为起点。

这种9·11 史观并不是追寻基地组织反美主义的“前历史”,因为麦凯恩似乎无意去历史中寻找美国遭遇伊斯兰恐怖袭击的因果链条;它更像是一种非线性的历史观,取消了“现在”和“过去”的分野,以循环式的时间视角看待世贸中心的生前生后。正如麦凯恩在访谈中申明的的那样,“只有理解了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③因此,《转》带读者返回到70 年代的纽约,万花筒式展现了这个城市的灵魂。1974 年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它和世贸大厦落成有关,更因为那是美国人刚刚经历了轰轰烈烈的60 年代,正处于幻灭的转折年代,不仅仅有越战的阴影,还有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让国民蒙受的羞辱。但也正是在那一年,影响21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开始出现——互联网。多年后,劫机者开着波音飞机撞向双子塔,美国大兵开赴伊拉克战场,而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在作者看来,这一切都体现了某种对称性,或者说历史的规律。

因此,作者有意用结构主义手法来搭建小说骨架:佩蒂特走钢丝的事件作为插曲放置在叙事段落中间,前前后后则拼贴了十多个不同人物的故事,这些人虽然背景各异,但却又凭因缘际遇而相互联系,并恰好在曼哈顿附近见证了四百米高空的“神迹”。他们中有从爱尔兰来到纽约黑人贫民区传教的年轻牧师,有以卖淫来换取毒品的街头母女娼妓,有在越战中失去儿子的白人母亲和法官父亲,有游走在纽约地铁里的涂鸦少年,还有一帮远在加州的早期电脑黑客……麦凯恩如同一个高超的口技者,赋予这些独立的故事不同的叙事腔调,同时又巧妙地将他们的命运和佩蒂特疯狂的云中舞蹈联系在一起,昭示他们冥冥中的结局是如何被世贸中心那天的奇观所改变。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麦凯恩与德里罗不约而同地以行为艺术表演作为全书的象征核心,前者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双子塔走钢丝,后者则是模拟坠楼的9·11 遇难者。这两种象征在空间方向上恰好垂直。如果说下坠的肉身是《旧约》式“堕落”(fall)的能指符号,那么在高空中的水平行走又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转》中的世贸大厦不仅仅是纽约的提喻,也不只是象征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庞大欲望,它更以其独特的双生结构构成了关于这个结构世界的隐喻。因此,小说里处处可见成对出现的主题和意象:信仰与欲望、爱与迷失、罪与拯救、母女与母子等。佩蒂特的这次高空杂耍虽然历史上真有其事,但麦凯恩故意隐去其名,因为作家认为两楼间的钢丝行走本身具有无限的诗意,并将之称为一种“纯粹性的移动”。(McCann 23)

于是,一根钢丝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即不仅可以南北塔连接起来,而且还是沟通二元对立世界的尝试。杂技大师在高空的行走(甚至还有舞蹈),既是向地面上的芸芸众生展现通往救赎的虚拟之桥,也代表了一种高难度平衡的可能,因为如果失去了平衡,走钢丝者会堕下

惨死。麦凯恩笔下的佩蒂特就在训练中摔下钢丝一次,险些毙命,但他相信这种事故绝不会再发生,因为那次失败带来了新的平衡——不仅仅是技巧上的,更是宿命上的。他有一种“到达彼岸的信仰”,并坚信“一个单独的瑕疵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美的作品都会垂着一截小线头”。(McCann 160-61)对于《转》中那些充满信仰激情的人物来说,跳跃在云端的怪人已不仅仅是在玩搏命的噱头,更成为了宗教意义上的天启;他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成为了被人间注视的“天使”。地面上的旁观者最大的悬念是,这个“空中之人”是否真的是神迹,他是否会坠下。

那么,这种寓言叙事又如何暗含了双子塔未来厄运的机锋呢?虽然麦凯恩故意几乎一字不提9·11,但却在全书中间插入了一张当时的新闻图片:右下角是佩蒂特渺小的身影在两楼间钢丝上行走,而左上角是架喷气飞机飞过世贸中心上空,并给人一种即将撞上的错觉(McCann 237)。这一看似巧合的构图给人以启示录般的意义,即代表未来血腥屠戮的9·11处于与杂技行走的对位,前者的毁灭意象被佩蒂特的诗意建构所抗衡,因为钢丝行走代表了沟通的努力,象征了平衡的可能。

如果说恐怖主义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被想象为大写的他者,那么麦凯恩试图告诉读者:第一,他者的形成往往由于主体视角的受限;第二,超越他者的途径在于沟通和交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部多声部小说让几个主要人物在不同叙事视角里出现,并通过差异性对比来突出单一叙事的不可靠性。在9·11叙事的语境下,对这种叙事不可靠性的克服,取决于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代际的人群间的互信与沟通尝试。而小说中少年黑客运用新兴互联网从西岸实时追踪佩蒂特的壮举,说明在麦凯恩那里,因特网构成了一种类似南北塔间那道钢丝的修辞格——只要勇于建立联结和沟通,只要信仰那伟大的平衡,9·11所启示的末日图景就有了更多救赎的希望。

德里罗在《坠》中同样运用了这种叙事角度的拼贴,他在基斯一家的故事中分片段插入了一位9·11劫机者的心理发展。从佛罗里达的飞行学校一直到撞上基斯工作的北塔前的瞬间,德里罗笔下的恐怖分子是一具充满迟疑恐惧和理想激情的血肉之躯。作者的这种平行视角,其实是希望读者发现恐怖分子与9·11受害者之间“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具有天壤之别”。(Wyatt 157)马可·阿贝尔(Marco Abel)认为,德里罗的这种手法深受电影艺术的影响,属于“辩证的蒙太奇”(dialectical montage),它构成了作家审视9·11的视觉修辞方式。(1237)其实,若按这种观点,麦凯恩在《转》中将“辩证的蒙太奇”运用得更为突出而精细,他拼贴的十多个小人物故事看似关联甚小,但最后都实现了某种神秘的沟通和契合,而且在题旨上都映射了9·11所引发的一系列存在主义诘问。

三、9·11叙事的存在理由和美学范式

通过对德里罗和麦凯恩这两部小说的比较阅读,本文认为“悼歌”(elegy)的竖轴和“批判”(critique)的横轴构成了9·11小说的叙事场域。^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坠》仅仅是在表现纽约普通人的创伤与疗救,也不是说《转》完全是在历史叙事中进行9·11批判。事实上,两部小说在横轴与竖轴都有所展开。《坠》里丽昂的母亲尼娜(Nina)是个艺术评论家,她代表了主流的9·11话语,认为恐怖分子代表了落后宗教世界里的纯粹之恶,应该被铲除,而她的情人则是70年代德国激进组织红军旅(RAF)的追随者,认为以小搏大的恐怖分子其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而国家机器的恐怖主义往往危害更甚。同样,麦凯恩也以心理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了小人物的创伤和疗救,其中最突出的是越战母亲克莱尔(Claire)和黑人妓女提莉(Tillie)。

作家通过意识流的写法,刻画两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如何在回忆里挣扎和沉沦,前者通过与底层黑人朋友格罗利亚(Gloria)的友谊而实现了自我救赎,后者则最终在监狱里走向了自杀。

齐泽克(Žižek)曾尖锐地批判美国媒体对9·11的“爱国主义叙事”过于空洞,同时也指出左派知识分子那种“美国罪有应得”的论调又过于冷漠,因为无论是阿富汗还是纽约,每一个死难者都享有“绝对且无法比拟”的尊严。(51-52)小说文学中的9·11叙事,正是因为它既能在想象性世界里构建“悼歌”的主体性,又能在思辨性话语中参与对恐怖主义的历史反思,所以具有新闻无法实现的批判视角和政论无法比拟的人性深度。

这也恰恰证伪了两种针对9·11文学的批评观点,即“反讽的终结”和小说的语言阙限问题。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认为,曼哈顿下城的归零地意味着“反讽时代的终结”,死亡此刻具有某种纯粹的严肃性。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同样主张重新回到美国核心的历史价值观中,构建牢不可摧的同一性身份,摒弃后现代文化中的政治正确和多元主义。这种右翼色彩浓厚的思维如果不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的“反智主义”的话(178),那至少也低估了小说这一体裁的多样性与精密性。德里罗和麦凯恩的文学实践表明,9·11小说不仅能够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关切“归零地”引发的存在诘问,更可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冷战思维,因为反讽与悲悼本身并不矛盾。

而奥哈根则担心,文学中创造的恐怖意象无法企及全角度电视直播的在场性——9·11是一场被集体凝视的灾难,即使是新闻性的调查报告也比小说家笔下精心设计的比喻更为震撼。这种观点其实也误解了9·11小说的美学追求。与新闻媒体(包括新新闻主义作品)相比,小说写作的时效性和直接性自然存在天然的滞后和不足,但小说家原本也无意用文字去摹仿灾难本身。想象性语言的优势在于对人物内部心理现实的表现,也体现在通过时空的移置和变形实现“意此言彼”的寓言性。

如果说9·11小说叙事的确存在其特殊的意义,那么它又体现了一种怎样有别于非文学9·11文本的美学范式呢?笔者认为,《转》和《坠》或许无法代表全部的同类作品,但至少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美学诉求,即以内化的艺术视角来理解和再现9·11事件。首先,纽约恐怖袭击就本体论而言,是一种艺术的形式。按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观点,9·11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先锋派(avant-garde)的行为表演艺术,但这并不是在刻意美化恐怖分子的罪行,而是在促使我们重新看待艺术的边界和价值,因为“先锋”本身就是来自战争术语,而艺术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提供关于美的愉悦感受,它更可能是在恐怖和暴力的展演中唤起观众对于崇高的敬畏。^⑤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恐怖的文化谱系可以一直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酒神传统。(2)正是因为恐怖作为一种艺术修辞,具有对主体崇高意识的唤醒效果,恐怖本身也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维度。对于当代小说家而言,恐怖分子和他们一样,都是需要借助“plot”这一双关语行事。9·11小说也不再将恐怖主义视为单向度的他者,而是关注作为题旨表达的恐怖对于后现代社会的话语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子塔之间的钢丝行走、纽约街头的坠人表演,以及世贸中心的悲剧坍塌,在小说文本内外构成了一种具有多重所指的艺术象征,警醒人们超越国族或宗教冲突的藩篱去审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

然而,仅仅指认恐怖事件的艺术性还是不够的,如何去认识作为艺术审美对象的9·11才是小说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考夫曼认为,早在《坠》之前德里罗就已经开始思考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论范式的建构,而这一思考的落脚点同样是艺术。在2002年的《纽约客》上,德里罗发表了短篇小说《巴德—迈恩霍夫》(“Baader-Meinhof”),故事发生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女主

人公长久驻足在德国画家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为20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创作的组图前,百思不得其解。最令她困惑的,是画家以新闻图片为素材进行二度创作,但又故意令这些“恐怖分子”的影像处于暗影中,处于失焦的状态。她隐约认为这些革命青年用恐怖袭击与国家暴力机器对抗,这种做法“具有意义。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不盲目和空洞。”(80)无独有偶,德里罗在《坠》中再次运用了绘画作为理解9·11的重要隐喻——小说中的尼娜是20世纪静物画家莫兰蒂(Giorgio Morandi)的研究专家,她发现画家笔下的日常物品“引领你内转,向下和向内。我所看到的东西,半隐半现,有某种比事物或其形状更深的东西存在。”(111)在德里罗看来,两位画家启示了一种阐释9·11的美学范式:即从大众媒体或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熟悉素材出发,通过畸像(anamorphosis)手法来颠覆我们对日常事物(包括恐怖分子)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让它们“在我们眼前似乎被破坏、被抛弃或解体”。(Kauffman, “Wake” 365)在这种美学阐释机制下,主流9·11叙事中所渲染的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天然界域就被模糊了,甚至连基地组织和美国政府两者的黑白区分也变得暧昧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即此即彼的灰色,让读者/观众永远处于“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

同样,麦凯恩在《转》中也呼应了这种“在艺术中求真”的9·11叙事美学。黑人妓女提莉虽然早早就操持皮肉营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但是她一生中最甜蜜的记忆是被某位中东男子包养的几周,而他给予提莉的最大馈赠是古波斯诗人鲁米的诗集。在“无论谁带我来到这里,也将会把我带回家”(McCann 60)这样的神秘主义诗句中,提莉感受到了灵魂的提升和救赎的希望,即使在临自杀前也记挂着诗集。另一个西裔少年同样也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喜欢在纽约地铁里用相机抓拍隧道墙上那些涂鸦作品,因为它们隐置于黑暗中,“被行进列车的车灯照亮,但只是片刻,以至于他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它们。”(168)此处,无论是东方诗歌还是地铁涂鸦,都和双子塔的高空行走一样,以艺术的形式构成了对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生命的某种神秘启示。当然,和德里罗小说人物所凝视的画作一样,这种启示的意义又始终是晦涩不明的,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9·11叙事的美学真谛所在。

结语

9·11小说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对新世纪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其人文关怀体现在本土性(locality)和全球性(globality)两轴,前者重在书写以纽约为提喻的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后者则发散到历史和社会的全景,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史和逻辑进行批判。在德里罗和麦凯恩书写的9·11叙事中,作家试图超越大众媒体和左翼思想界的论争,在文学中对“归零地”的人类处境予以自省和慰藉,并检审恐怖主义对现代性进行悲剧抗争背后的否定意义。这两部作品的成功,体现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诠释和再现9·11时的独特力量,它所昭示的美学范式也更深刻地体现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

注解[Notes]

- ① 在亚马逊网络书店的“9·11小说书单”上列有28本相关小说(截止至2007年10月)。书单创立者Craig VanGrassstek将9·11小说定义为“所有涉及9·11袭击及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和社会等议题的小说”。
- ② 在小说《球员们》(1977)中,女主人公在新落成的世贸中心里工作,她觉得“这楼似乎不会永远存在”。关于《地下世界》中隐射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视为袭击目标的情节,可参见书中第184页。

- ③ 麦凯恩的这种循环史观受福克纳影响颇深,所引部分见2009年7月31日《纽约时报》对作者的访谈。 <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odcasts/2009/07/31/31bookreview.mp3> > .
- ④ 关于9·11文学中“悼歌”和“批判”这两种不同进路的提法,笔者受惠于David Wyatt的文章“September 11 and Postmodern Memory”(第140页)。
- ⑤ Richard Schechner的这一观点,见于2010年10月11日他在南京大学高研院做的学术报告《作为先锋艺术的9·11?》。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bel, Marco. "Don DeLillo's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Literature, Images, and the Rhetoric of Seeing 9/11." *PMLA* (October 2003): 1236-50.
- Breithaupt, Fritz. "Rituals of Trauma; How the Media Fabricated September 11."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September 11*. Eds. Steven Chermak, Frankie Y. Bailey, and Michelle Brown. New York: Praeger, 2003. 67-81.
- Buell, Lawrence. "The Unkillable Dream of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Moby-Dick* as Test Case."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 1-2 (Spring/Summer 2008): 132-55.
- Butler, Judith. "Explanation and Exoneration, or What We Can Hear." *Social Text* 20. 3 (Fall 2002): 177-88.
- DeLillo, Don. "Baader-Meinhof." *The New Yorker* (April 2002): 78-82.
- . *Falling Man*. New York: Scribner, 2007.
- .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December 2001): 33-40.
- Eagleton, Terry. *Holy Terror*. New York: Oxford UP, 2005.
- Jameson, Frederic. "The Dialectics of Disaster." *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 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 Ed. Stanley Hauerwas, and Frank Lentricchia. Durham: Duke UP, 2003. 55-62.
- Junod, Tom.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The First Great 9/11 Novel." *Esquire* 8 July 2009 < <http://www.esquire.com/fiction/book-review/let-the-great-world-spin-book-review-0809> > .
- Kaplan, E. An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2005.
- Kauffman, Linda F. "The Wake of Terror: Don DeLillo's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Baader-Meinhof,' and *Falling Ma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4. 2 (Summer 2008): 353-77.
- . "World Trauma Center."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1. 3 (Fall 2009): 647-59.
- McCann, Colum.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New York: Random, 2009.
- Miller, Laura. "Falling Man." *Salon.com* 11 May 2007 < <http://www.salon.com/books/review/2007/05/11/de-lillo/index.html> > .
- O'Hagan, Andrew. "Racing Against Realit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June 2007 <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7/jun/28/racing-against-reality> > .
- Qian, Mansu. *Essays on American Civilization*. Shanghai: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2010.
- [钱满素:《美国文明散论》,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
- Rosenblatt, Roger. "The Age of Irony Comes to an End." *Time* 24 September 2001 < <http://www.time.com/time/covers/1101010924/esroger.html> > .
- Wyatt, David. "September 11 and Postmodern Memory." *Arizona Quarterly* 65. 4 (Winter 2009): 139-61.
- Žižek, Slavoj.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Five Essays on September 11 and Related Dates*. New York: Verso, 2002.

(责任编辑:舒程)